

民國高教體制下的經學課程：從大陸到臺灣^{*}

車行健^{**}

（收稿日期：109 年 10 月 12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2 月 1 日）

提要

民國以來，經學歷經了許多挑戰，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其與教育的關聯，一方面經學被支解歸併入其他新式學科，另一方面則是在各級學校中取消經學的相關課程。但在一九三〇年代以前，經學仍受到學界一定程度的重視，在高等院校的教育中依然有其生存的空間。然而，隨著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的態勢底定後，教育部銳意推動高等院校課程的標準化，從制度面對高校課程進行全面的整理與規範。這個做法對經學在高校的傳衍與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本文擬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以大陸時期為主，著重在課程標準化下，經學課程朝向儒家經典教育方向的發展。後半部則將焦點置於一九四五年後臺灣高等院校施行的情況，冀望透過這樣的探索，能對經學在近代高等教育體制中的實存樣態有較清楚而完整的認識。

關鍵詞：高等院校、高教體制、課程標準化、經學課程、儒家經典教育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民國以來高等院校中的經學課程與儒家經典教育」（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4-150-）之研究成果。論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國經學研究會與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合辦之「第十一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 年 10 月 26 日。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晚清以來，西力東漸，為古老的中華帝國帶來翻天覆地的鉅大改變，在教育文化層面，首當其衝的便是自漢代以來即與治權緊密依附在一起，成為國家統治機器一環的經學（即所謂「經術」），朱維錚（1936-2012）曾直言：

張之洞（1837-1909）在一九〇五年廢科舉時，其實也同時廢掉了經書、經學，亦即廢去經學成為統治學說的基礎。¹

但清廷在逐步廢除科舉制度的同時，仍然將經學保留在大學堂的教育中，將大學分科的原有七科，再增設經科。²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卻從一九一二年間，相繼頒行《大學令》、《大學規程令》，明令廢止經學科。³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1868-1940）當是此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其自述道：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再無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⁴

¹ 楊晉龍、蕭開元整理：〈朱維錚教授談近代經學史研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2期（2000年6月），頁140。

² 清季管學大臣張百熙（1847-1907），其所擬定的學堂章程，於光緒28年（1902）頒行，即所謂〈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專門分科，仿日本例分為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等七科，文學科中包括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和外國語言文字學七門學科。但此章程不到一年半即廢止，於光緒29年（1903）另改頒行由張之洞、張百熙和榮慶制定的〈奏定學堂章程〉。此章程在原來七科之外，增加經學一科，成為八科。經學科中下轄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理學等十一個學門。一般認為，這與張之洞對經書重視的主張有關。以上參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收入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頁78-85；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184-194；王應憲：〈舊學新制：京師大學堂經科大學史事考〉，《史林》2018年第1期（2018年2月），頁96-97。然此經科大學從1910年才正式開辦，存在僅三年便宣告結束。參王應憲：〈舊學新制：京師大學堂經科大學史事考〉，頁101-106。

³ 參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頁197-200；王應憲：〈舊學新制：京師大學堂經科大學史事考〉，頁106。

⁴ 蔡元培：《自寫年譜》，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17，頁469。

左玉河認為這樣的做法，使「經學因失去其必要的生存空間而漸趨衰亡」。⁵

不過經學被支解歸併入其他學科的做法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需要時間醞釀的；也不完全因客觀政策面的改變，就馬上翻轉現有的教學和學術體制。桑兵從近代國學發展的角度，提出了一個較宏觀的觀察：

經過近代國學研究，中國學術的形式與內容出現重大而明顯的變化。形式上，以經學為主導的傳統學術格局最終解體，受此制約的各學科分支按照現代西學分類相繼獨立，並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清末國粹學派提倡諸子學，打破獨尊儒術的偏見；民初破今古文之分，跳出家法，研究學術；到了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經學最終被完全化解，整個學術按照現代西學規範重新分類，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方言學、考古學（含博物學）、社會學、人類學（含民俗學）、歷史學（含歷史地理）、宗教學、哲學等一整套體系逐漸形成。⁶

至此，已不僅是經學被物理式地拆解併入其他學科的情況，而是整個經歷如同化學反應，甚至生物演化似地，被轉化蛻變成諸多的現代新興學科。

即使如此，周予同（1898-1981）所謂的：「五四運動以後，『經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經學史』的研究卻急待開展。」⁷仍是不容忽視的現實狀況。做為純粹學術的研究，不只「經學史」本身，連同「經學概論」（或「經學通論」及其類似課名）等基礎性的學問，仍受到學界一定程度的重視，且在高等院校教育的市場上依然有其生存的空間。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六月，錢穆（1895-1990）在《燕京學報》第七期發表著名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由此文引發的後續效應，似乎為經學在高等院校的教學及傳承帶來沈重的打擊。錢穆晚年屢次聲稱：

余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學本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經學課遂多在秋後停開。⁸

⁵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頁 247。

⁶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0-21。

⁷ 周予同：〈「經」、「經學」、經學史——中國經學史論之一〉，《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661。案：周氏此文雖發表於 1961 年，但置諸 1920、30 年代，其語仍然適用。

⁸ 錢穆：《師友雜憶》，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63。

又曰：

民國初年，雖有新文化運動，各大學沒有不開經學課程的，而這些課程便和新文化運動相呼應，盡是疑古辨偽，一筆抹撇。但從民國十九年以後，經學不能再照康有為那麼講，從此沒人開這些課。直到今天，也就很少人學經學了。⁹

然而證諸一九三〇年代之後的中國各大學課表，錢穆的說法並沒什麼根據，筆者於二〇〇八年發表〈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¹⁰用實證的方法，從課程史料的角度入手，提出若干反證，對錢穆的說法加以質疑。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王應憲教授復作〈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一文，更為詳盡地整理還原出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包含香港）各大學中所開設的經學相關課程，包含經學概論、經學通論、經學入門、群經概論、群經通論、群經大要、群經大義、群經要略、群經選讀、經子概論、經學源流、經學歷史、經學史、經學史略、經學通史、中國經學史等。¹¹由此可知，經學雖然在政治、社會與教育文化上失去絕對主宰的力量，但正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做為學術研究對象和教學內容的經學（包含經學史、經學通論與分論、經書、以及與之相關的各類專論），依然是了解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的重要憑藉，在學術界和文教界中仍有實際的需求，這也使經學得以持續在當時高等院校的課堂中傳授下去。且更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在楊儒賓所謂「納中國於臺灣」的格局下，使得「這一甲子的臺灣學術可以說是民國學術的延伸」。¹²不但將大陸的高教體制搬到臺灣來，繼續在臺灣這塊土地生根茁壯；而且亦在「學統」上，完整地繼承了民國學術的精髓，為經學在戰後臺灣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¹³所謂「高教體制」，當包含教育部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與高等院校課程規畫設置的制度面，以及落實到高校中的教學行政和實務的施行面。藉由法令制度的規範，方才有效地保障經學在戰後臺灣高校的傳衍和發展。

⁹ 錢穆口述，胡美琦、何澤恆、張蓓蓓整理：《經學大要》，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2冊，頁267。

¹⁰ 此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1- 1949）第三次學術研討會」，2008年7月17日，後刊載於《漢學研究通訊》第28卷第3期，頁21-35；又收錄於車行健：《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頁5-40。

¹¹ 王應憲：〈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中國學術年刊》第35期（2013年9月），頁116-119。

¹² 楊儒賓：《1949禮讚》（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111、171。相關論述可參林桶法：《1949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頁406-412。

¹³ 由此可知，錢穆的回憶至多只能當作具有象徵意義的特殊言說來看待，藉此預示經學在當代學術和教育環境中日薄西山的命運。但即使將錢穆的話語做如是之解讀，其預示性的效果亦不宜過度放大。

戰後臺灣高等院校基本上沿襲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的高教體制，經學相關課程也普遍施行於各大專院校中，然而其具體實施的情況，迄今為止，尚未見有專門的論著進行全面的探究。¹⁴作者不揣鄙陋，擬從高教體制的角度入手，試圖對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課程做一整體考察，以期能對經學在臺灣的傳承和發展有更明確和全面地了解與掌握。

本文擬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以大陸時期為主，著重在課程標準化下，經學課程朝向儒家經典教育方向的發展。後半部則將焦點置於一九四五年後臺灣高等院校施行的情況，而不及於中共建政後的新中國，蓋其體制與施為舉措皆已多所更張，與民國政府所為呈斷裂性的發展，當另外處理為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誠然如陳朝爵（1876-1939）在一九三〇年代所觀察的：「現在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或有經學，而他院他系則絕無。」¹⁵但事實上，中文系（以及師範院校的國文系）雖然主要承擔了經學課程在高等院校教授的任務，然而經學課程實際上包含了經學的整體知識和個別經書典籍之講授兩類，這兩者都有可能在文學院的其他科系中施教（主要是歷史系和哲學系），而後者更有極大的機會在全校性的課程中教授，因此本文所考察者基本上雖以中文系為主，亦會涉及文學院歷史、哲學二系，乃至於全校性的共同課程。

¹⁴ 對某一學科或學科下轄的學術領域之形成、建制與演進，以及對其中所涉及之研究和教學的回顧、檢討與評估，不僅能使後繼者對其所身處之學科領域有更清楚地了解，而且也能促進該學科領域的進步發展。學界目前關於學科史、課程史的研究，可說正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以中文學門而言，筆者寓目所及，如陳平原曾對北大早期中國文學史教材進行關注，又有相關論著專論文學史學科建制的問題。陳國球亦曾發表一系列的論文，追溯「文學」如何進入現代中國大學，成為可在大學裏被傳授、考核的知識；以及「文學批評」進入中國的過程，和高校中文系建立「文學批評史」的需求。沈衛威則探討「新文學」進入現代大學課堂的情況，鮑國華復原了「小說」步入現代大學殿堂的史實，姚丹亦曾從西南聯大某些教師倡議中文系與外文系合併為文學系所引發的討論，來對二系課程的設置和目標加以檢討。再就歷史學門而言，這類的研究也不少，如劉龍心探討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建立的議題、陳弱水和李東華（1951-2010）等人聚焦於臺大歷史系，分別闡述其與中國現代史學傳統和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等面向。而王應憲則在蒐集整理基本史料的基礎上，編校有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和史學系課程概覽的資料彙編，尤有助讀者對歷史系的發展提供全面的掌握。其他還有針對教學所作的檢討，如王壽南、張哲郎曾主編有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和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的論文集，皆有觸及學科領域之回顧與反省，具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就本文所探討的經學來說，除筆者和王應憲的研究外，吳國武和黃明喜皆嘗為文探究經學的學科建置和學術內涵。此外，許振興和金培懿則針對香港大學經學教育作了深入的探討。筆者亦編有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教育之論文集，收錄九篇探討戰後臺灣經學教育的論文。上述諸文皆共同針對近代以來經學在高等院校的發展進行深入的探索與省察。相關書目請參文後所附之「推薦書目」。

¹⁵ 參龔鵬程主編：《讀經有什麼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7。

二、大陸時期教育部課程標準化設置與高校中的經學課程

（一）課程標準化進程下的經學科目

中國近代大學課程規劃始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頒布之〈奏定學堂章程〉，該章程將大學分為八科四十六門，各學門課程分「主課」、「輔助課」及「隨意課」三種。以本學門研究法為主課，以專門與相關之學門為輔助課，隨意課不拘學門隨意選讀。各科學生於畢業時須交自著論文一篇，此為中國大學課程規劃有主修、副修、必修、選修及畢業論文之始。

民國二年（1912）頒布〈大學規程〉時，將大學分為文、理、法、商、農、工、醫等七科，共六十九學門，對各科之科目亦皆有專門規定，每學門必修科目最少者十一種，最多者為醫學科，多達五十餘種。此時各科門及其修習科目較前更為詳備，部分科目甚至訂有課程綱要，此可謂高等院校規定課程之發端。然至民國八年（1919）之後，教育界受思想解放之激盪，乃有改革學制之議。民國十一年（1922）教育部頒布〈學校制度改革令〉，規定大學採用選科制，於是全國各大學統一課程之標準遂生動搖。及至民國十三年（1924）教育部又頒布〈國立大學條例〉，規定「國立大學各科系及大學院各設教授會，規劃課程及其進行事項。」當時高等院校在數量上正積極發展，各科系課程又完全委諸各校自行規畫。此時期之大學課程較為分歧，而大學程度之不齊亦頗受議論。

這個現象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有了很大的改觀，國民政府於是年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與會者針對大學課程漫無標準之現象，於會中提出「大學教育應該確定標準，提高程度」及「規定私立學校課程、師資和設備的標準」等主張。教育部於民國十八（1929）年公布〈大學規程〉時，即先行規定大學及獨立學院以黨義、體育、軍訓及第一、第二外國語為共同必修科目，並明定一年級新生應設基本科目，至於各學院或各科之科目分配及課程標準則另定之。課程頒布之次年（1930），教育部即著手組織大學課程及設備標準起草委員會，大學課程之整理工作，於焉開始。¹⁶

¹⁶ 以上三段敘述係綜合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局，1940年），頁1-3；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總頁碼1363-1364；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委會編輯小組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大專教育編》下冊（臺中：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87年），頁936；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年），頁163-164等之相關材料而成。案：葉文心曾指出：「南京教育部頒布並強制執行了一系列規章制度，既企圖黨化學生，規範大學行政部門，又指望把不同的學院和大學統統納入高等教育體制的規範。然而，由於南京政府的目標和手段通常公然從屬於意識型態和政治，因此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高等教育最顯著的一致性，與其說是對文化信仰

民國二十七年（1938），新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1900-2001）更銳意推動課程整理工作。¹⁷是年二月，親函全國教授及各科專家，徵詢對於大學課程之意見。四月間，綜合各方意見，並根據大學教育方針及國家實際需要，決定先從文、理、法三學院之課程著手，並製定〈文理法三學院各學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以為整理之依據。其原則為規定統一標準、注重基本訓練、注重精要科目，此外亦強調全國大學各院系必修及選修課程，一律由教育部規定，必修科目須全國一致；選修科目，各校得在部訂範圍內參照實際需要酌定。¹⁸教育部先行制定各學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於該年頒行〈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商學院之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於民國二十七年度實施）。接著又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制定〈師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與〈各學院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及頒布〈大學文理法農工商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施行要點〉，一律就二十八年年度第二年級學生開始施行，以作為抗戰初期統一各校標準，提高學生程度而修正大學課程之依據。¹⁹從這樣由上而下，中央集權式的統一課程制定與規範的制度性作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經學課程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的際遇與處境。

在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頒布的〈文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中，沒有列出一門與經學或經書有關的科目，而在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頒布的〈文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中的不分組或分組後適用於文學組的「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共規定有十二門

和教育理想的共識，倒不如說是對南京政府的政權和意識型態權威的讓步。學校如果不能或拒絕承認國民政府的新制度，就會被關閉，或得不到官方認可的身分，就像上海的幾所大學和聖約翰大學那樣。」見葉文心撰、馮夏根等譯：《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彼時大學課程整理工作的背景，或當作如是觀。

¹⁷ 陳氏對此著力甚深，其自述接任教育部長後，發現當時中國的大學「大都像外國租界，這個完全採德國學制，那個完全採法國學制，其他不是採美國制，即是採英國制，但是採中國學制的又在那裡？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我於是下了決心，請了專家訂定大學課程標準，分『必修』及『選修』兩種，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歷史材料放入必修科，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像一座中國的大學，我排除了一切的障礙，收回了文化的租界。」見陳立夫：《從根救起》（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頁65。這項政績頗令陳立夫自豪，在其回憶性的著作中，屢屢提及，如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頁20-22；陳立夫：《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頁26；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251-253；張緒心、馬若孟編述，卜大中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頁294-295，惟所述內容均大同小異。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課程標準的關係，可參考汪伯軒在《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文中所作之討論，見汪伯軒：《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年），頁201-204。

¹⁸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5-6；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總頁碼1363-1364；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頁164。

¹⁹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7-10；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頁164。

必修科目，當中的「中國文學專書選讀」的四至六學分的課，授課內容即為群經諸子。而在「中國文學系選修科目表」中，二十門課中完全沒有一門與經學或經書有關。語言文字組的必修和選修目表中更是連一門與經學或經書相關的科目都沒有（除非將「韻書研究」、「等韻研究」等小學類的課也算進去）。²⁰師範學院中的「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和「國文學系選修科目表」情況亦同，只在必修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專書選讀」教授群經諸子。²¹檢視歷史學系及師範學院中的史地系的必修和選修科目表，更完全不見經學或經書課的痕跡。²²反倒是哲學系的必修科目中有「孔孟荀哲學」（六學分），選修科目中又有「周易哲學」（三學分）二門與經學經書相干的課。²³由此亦可得見，在當代哲學學門的形成過程中，傳統經書與經學的知識，仍為建構中國哲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成份。

國民政府於大陸時期又陸續進行兩次課程修訂，第一次修訂於抗戰末期，目的在適應抗戰建國之需要，採重點修訂，範圍僅及文、理、法、師範四學院課程，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公布。第二次修訂於勝利復員後，目的為配合推行憲政及戰後建設之需要，計修訂文、理、法、商、農、工、醫、師範八學院，共五十四學的課程，於三十七年（1948）底公布。²⁴檢視與經學相關之文學院課程，發現這兩次的修訂均與二十七年所整理制定的課程相去不遠，其規模與旨趣仍是相沿襲不變。但在某些細節中，稍有增補或可看到較明確的規定。在三十二年修訂的文學院諸系課程中，只有中文系、師範學院的國文系與哲學系保有經學相關的課程，歷史系與師範學院的史地系則依然付之闕如。然而中文系與國文系亦只有在必修科目中的「專書選讀」課中方有教授經書的機會。「專書選讀」開設在第三與第四學年，每學期三學分，共計十二學分。所選讀的專書共有經典、諸子、諸史、文翰與文史評五類二十五部，經典類明確規定包含《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經》、《禮記》與《春秋左氏傳》（附《國語》）等七部。諸子類規定有《荀子》、《莊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六部。史籍類包括《太史公》、《漢書》、《後漢

²⁰ 以上見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23-24、35-40。

²¹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108-110。

²²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48-52、123-127。案：這個狀況也可從王應憲所編校的《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中得到大致的印證。王氏所蒐錄的這個時期中國各大學歷史系課程資料，幾乎皆未見設有經學及經書的課程，僅有少數的文史系，如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文史學系（1936 年）、廣東省立勤勤大學教育學院文史學系（1935 年）、河南大學文史學系（1935-1936 年）方有「經學通論」或「經學專題研究」之類的課，但這些僅能視為歸屬於中文專業的課程。見王應憲：《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冊，頁 135、243、268。倒是顧頡剛（1893-1980）於 1931、1932 年間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設的「尚書研究」似可視做特例。見王應憲：《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冊，頁 58、63、69。

²³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45-48。

²⁴ 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總頁碼 1364；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頁 166-167。

書》、《三國志》、《水經注》、《通鑑》等六部。文翰類有《屈原賦》（附宋玉以下）、《文選》、《杜詩》、《韓文》四部。文史評類則有《文心雕龍》（附《詩品》）和《史通》二部。開課方式允許單開曰「某書選讀」，或合開曰「某類選讀」，如「經典選讀」、「諸子選讀」等。亦可合二書開，如「《詩》《禮》選讀」、「《管》《韓》選讀」、「《史》《漢》選讀」。至於哲學系則是於必修科目中有「孔孟荀哲學」上下學期六學分的課，選修科目中有「周易哲學」三學分。²⁵三十七年所修訂的課程，只及於分院共同必修及分系必修的科目，不及於分系選修科目，選修科目暫照以前規定辦理。²⁶中文系與國文系必修的「專書選讀」實施方式基本沒有什麼改變，但哲學系的必修科目中，卻取消了「孔孟荀哲學」，雖增列了「專家及專書研究」十二學分的科目，然未見具體的規定，不能確定是否仍保有與經學或經書相關的課程內容。²⁷

（二）經典教育思維下的經書課程

從經學課程的範圍來看，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制定的統一的大學課程，實際上是以經書的教授為主，而非偏向於較專門精深的經學整體之課程。所教授的經書也主要集中在《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經》、《禮記》與《左傳》等七部基本的經籍。這樣的結果應與當時課程制定的指導原則有關，在陳立夫初接任教育部長時所製定的〈文理法三學院各學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中，揭櫫了規定統一標準、注重基本訓練及注重精要科目三個原則，其中「注重基本訓練」的原則強調「大學課程應先注意於學術廣博基礎之培養，文理法各科之最基本學科，定為共同必修，然後專精一科，以求合於由博反約之道。」而「注重精要科目」原則亦要求「今後大學科目之設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於一種學科之精要科目有充分之修養，精密之研討，而有融會貫通之精神，凡偏僻與瑣細之科目，得由學生自習，一律不列入大學課程。」²⁸就經學教育的實施來說，經書所教授的內容確實是較為根本和基礎的，不似經學通論和經學史之類涵蓋經學整體的科目，須涉及較多專門精深的知識。²⁹

²⁵ 以上敘述俱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5年），頁77-84、87-92、141-142、146-150、152-156。

²⁶ 見三十七年發布的〈大學文理法醫農工商師範八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科目表施行要點〉第六點，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2。

²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4-6、7-9。

²⁸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5。

²⁹ 胡山源（1897-1988）在1939年12月的《中美日報》「教育隨筆」欄上，發表〈論大學國文系及其科目〉，在此文中他針對教育部公布的中文系必修科目表加以檢討，認為：「在這表中，不見了『國

不只此也，導致這樣的課程制定的結果，還可能與當時主流學界對經學的觀感有關，這可從參與課程制定的關鍵人物朱自清（1898-1948）的言談中看出。朱自清是民國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間，教育部展開制定文、理、法三學院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時，擔任中國文學系科目表草案的起草人員和修訂人員。³⁰他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發表〈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他在此文中雖沒有直接針對這個問題回應，但卻從對傳統學問採取批評態度的角度說道：

按從前的情形，本來就只有經學，史子集都是附庸；後來史子由附庸而蔚為大國，但集部還只有箋注之學，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國以來，康、梁以後，時代變了，背景換了，經學已然不成其為學；經學的問題有些變成無意義，有些分別歸入哲學、史學、文學。諸子學也分別劃歸這三者。集部大致歸到史學、文學；從前有附庸和大國之分，現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³¹

既然經學已不成其為學，經學的問題有些也變成無意義，那又何必在大學中文系中設置專門講授經學的課？但是經書則不然，他反對舊日專以讀經為主的教育方式，認為有偏枯失調之弊，主張改以新式的教育來增進學生的經典訓練。而他所謂的經典訓練更擴大了範圍，不以經書為限，且又強調按學生程度選材，認為可以免掉囫圇吞棗的毛病。³²他的這些理念皆完整地呈現在他為教育部所規劃的大學中文系科目表中，廢止專門的經學課程，將經書經典化，與史部、子部、集部的經典一起納入必修的專書選讀中。

學概論』和『文學概論』這兩項，實在是大進步。以前若干大學認為必修的『經學概論』也不見了，這進步也不小。」在他看來，「這許多『概論』，在本身既是一團糟，沒有清楚的範圍、一定的對象，又沒有適當的教本，可以作為準繩，教授起來，也不過尋章摘句，徒見其『瑣細』而已，學生所得的也只是一團糟，『概論』云乎哉！」其從施教和學習的角度所作的批評，與教育部課程製訂的原則大致是相一致的。胡文後被由郭紹虞、周予同、葉聖陶和朱自清所編輯的《國文月刊》加以轉載，刊於1946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49期中，引文見胡山源：〈論大學國文系及其科目〉，《國文月刊》第49期（1946年11月），頁20。

³⁰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11、12。當時任中文系科目表草案審查人員的是黎錦熙（1890-1978）、羅常培（1899-1958）、錢基博（1887-1957）和盧冀野（1905-1951）等四人。見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11。案：據朱自清自述，中國文學系科目草案是他和羅常培共擬的，代表他們的共同意見。見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卷2，頁7。此文原刊於《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

³¹ 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卷2，頁10。

³² 見朱自清：《經典常談·序》，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卷6，頁3。

不過，國民政府教育部雖然全力推動統一課程，但在執行面上並非暢通無阻，仍是面臨不少的反彈與阻力，何炳棣（1917-2012）即曾舉過西南聯合大學教務會議決抵抗教育部壓力的例子：

緣一九三九秋至一九四〇春夏之交，陳立夫以教育部長的身分曾三度訓令聯大務須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此項訓令的目的當然是加強蔣政權對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統治。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大常委會的方式，抵抗駁斥陳立夫的三度訓令。³³

這件被何炳棣視為「在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制的聯大光榮校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措詞說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由馮友蘭（1895-1990）執筆，函中陳訴數點頗能擊中強推統一課程之要害者：

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數馳驟，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³⁴

即使存在著這種公開浮上檯面的齟齬，但教育部製定出的科目表是否能實際規範到所有學校的各有課程，還是頗令人存疑的。首先，依照二十七年製定的〈文理法三學院各學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本就保留選修科目予「各校斟酌變通之餘地」的空間。³⁵其次，各校也不見得完全切實遵行。³⁶事實上，從推動統一課程的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八年

³³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年），頁196-197。

³⁴ 此函收錄於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卷3下，頁191-192。

³⁵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5。

³⁶ 參蕭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82-383。

間，據王應憲的調查，至少還有十一間高校開有「經學通論」、「經學概論」、「群經概論」、「群經選讀」、「群經大義」和「經學史」之類的課。³⁷這些不在文學院共同必修和文學院分系必修與選修科目表中的以經學為整體講授目標的課程，在課程屬性中當屬於可讓「各校斟酌變通」的選修科目。

（三）大陸時期高教體制下的經學課程之特色

總體來看，大陸時期高等教育體制下的經學課程係以經書教授為主的方式施行，雖亦有經學整體的課，卻並非屬於制度性統一規範的必修與選修科目，因而難以普行於各校中，且亦非常態性的開設，其不穩定性和變異性均極大。王應憲調查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八年間，中國大陸各大學開設以經學為整體講授目標的課程共有六十四筆紀錄，然而大多集中在一九三八年前。一九二二至一九三八年的十六年間共有五十二筆，但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十年間卻只有十二筆，差距頗為懸殊。由此不難看出，教育部統一課程的政策確實為高校經學教育帶來了極大的斷傷。前述錢穆看似不盡合乎事實的回憶，或許應放在此背景與脈絡下來解讀，方能尋味出其中的合理性。整體而言，若從悲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現象，固然顯示出其時高校經學課程的存在空間被極度的擠壓。然而若從樂觀的一面來看，亦可說經學在高校的傳承依然未曾消亡，雖然經學整體的課程未被納入教育部制定的科目表中，但作為經學基礎之經書的課程，卻仍被放入「專書選讀」的必修科目中，而得以繼續傳授下去。

三、遷臺後高校的實施情況

（一）遷臺後高校經學課程規定之沿革

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四九年遷來臺灣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高等教育還是延續著大陸時期的作法，仍然嚴格遵守教育部制定的課程規範，並沒有太大的更張。以中文系來說，一九六、七十年代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且兩度擔任系主任的知名文字學家李孝定（1918-1997），他晚年在回憶錄中對南洋大學中文系課程的設置，曾有如此的評述：

³⁷ 王應憲：〈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頁 119。

南洋大學是一間新創辦的大學。……歷任系主任，都是新加坡政府從臺灣高等教育界遴聘擔任；所訂課程表，和臺灣各大學中文系，如出一轍，除了將「國文」一辭，改稱「華文」外，幾乎連小異都不存在，只要看系的全名，和課程表的結構，任何一位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士，一眼便能看出，是從傳統中國中文系全盤移植過去的。³⁸

所謂「和臺灣各大學中文系，如出一轍」、「幾乎連小異都不存在」云云，不正說明了在教育部課程統一規範的政策下，彼時臺灣各大學課程存在著高度一致性和穩定性，甚至遠及於東南亞的華校。

就經學課程而言，雖然經歷了數次的課程修訂，但其規模方向仍不異於先前所實施者，即用包裹收納在「專書選讀」的方式來教授經書。政府在初遷臺時，沿用民國三十七年頒布的〈大學文理法醫農工商師範八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科目表〉，於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間施行³⁹，其中的「修訂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之「專書選讀」，規定的書目和三十三年的科目表中所規定的五類二十五部稍有增減，如「諸子」多了《老子》，「史籍」刪減《水經注》和《通鑑》，「文翰」增加其他名家詩文專集，「經典」和「文史評」兩類沒有改變。此外，規定學分卻由原來的 12 學分縮減為 9 學分。師範學院國文系對此的課程規定與文學院中文系相同。⁴⁰民國四十七年發布的「修訂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中文系「專書選讀」書目同於三十七年度者，但學分數則恢復成 12 學分。「修訂師範學院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的「專書選讀」亦調為 12 學分，然未列舉專書書目，當同於文學院中文系者。⁴¹民國五十四年公佈的修訂課程，文學院中文系「專書選讀」學分數改成 12-16 學分，而所選讀書目中，最明顯的調整是規定「《論語》《孟子》應必修」。師範學院國文系則上調為 18 學分，亦未見具體書目規定，當亦同於文學院中文系。⁴²

不過這種獨尊《論》《孟》的作法，卻也引發了曾擔任大學課程修訂委員會中國文學系召集委員的程發軔教授（1894-1975）的質疑。他在民國五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去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力陳該兩書學分已足部定十二學分，其他專書形同虛設，建議將「《論語》

³⁸ 李孝定：《逝者如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 105-106。

³⁹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 3。

⁴⁰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 6、65-66、80。

⁴¹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七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8 年），頁 10-11；頁 15。

⁴²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65 年初版、1970 年再版），頁 4-5；頁 21。

《孟子》應必修」規定之語刪去，以符事實。高教司因而允諾於下次修訂大學科目表時，提出研究改進，但在未修訂前，得由各校酌情辦理。⁴³民國六十一年對中國文學系課程的修訂，「專書選讀」課程的規定又做了些調整，即學分數再上調為必修 12-18 學分，且各一科目每學期以不超過四學分為原則，又包括習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書目規定方面，將《四書》單獨從原先的五類中拉出，且要求「應必修」。開設的方式可單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中一至二種。⁴⁴由此看來程發軔的建議並沒有獲得採納。

至於師範學院國文系的部分，則亦做了些調整，如規定學生在必修科目外，另須選修「專書選讀」至少 20 學分，始得畢業。又如規定的專書書目縮減至只有 17 種科目，但其中經書占了 5 科，包括「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和「左傳」。⁴⁵民國六十六年公佈的新修訂課表，中文系「專書選讀」部分同於民國六十一年科目表，惟不見習作的規定。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專書規定亦略同於民國六十一年所公布的課表，專書科目除五經不變外，其他書目略有調整放寬。⁴⁶

（二）師範院校的「四書」課程

在這兩次的課程修訂中，「四書」雖不見列於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專書科目中，但這並不代師範院校對其不重視。與此相反，早在民國四十三年，教育部即已行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要求全體師範生必須研讀《四書》，而將其列入師範學院及教育學院各學系的共同

⁴³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部分，頁 1-2。

⁴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必修科目表（民國六十一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2 年），頁 7；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3 年），頁 33-35。案：此次中文系課程修訂，係由教育部聘請蕭繼宗、尉素秋、劉錫五、徐可燦、龍良棟、李殿魁、王靜芝、王初慶等八位先生組織委員會，並聘請王靜芝任召集人，從事修訂工作。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頁 26。

⁴⁵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必修科目表（民國六十一年）》，頁 394-39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頁 495-496。案：此次師範學院國文系課程修訂，係由教育部聘請李曰剛、周何、胡自逢、程發軔、黃錦鉉、黃永武、劉正浩、黃義郎等八位先生組織委員會，並聘請李曰剛任召集人，從事修訂工作。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頁 460-461。

⁴⁶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必修科目表報告書（民國六十六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7 年），頁 636。案：此次中文系必修課程修訂始於民國六十五年，由教育部聘請劉述先、張以仁、謝一民、章景明、楊宗珍、林明德、陳問梅、劉兆祐、彭醇士、李殿魁、金榮華、傅錫壬等十二位先生為委員，洪讚為秘書，組織小組委員會，並聘請劉述先任召集人，從事修訂工作。師範學院國文系必修課程之修訂，則由教育部聘請李鑒、戴璉璋、劉正浩、王熙元、黃錦鉉、黃永武等六位先生為委員，黃義郎為秘書，組織小組委員會，並聘請李鑒任召集人，負責修訂工作。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必修科目表報告書（民國六十六年）》，頁 28、602。

必修科目中。教育部於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發布臺(四十三)普字第一二〇〇六號令，規定：

- 一、查儒家思想，體系完整，微言大義，皆散見《四書》各篇章中，總統迭次訓詞均有周詳指示。師範生為人師表，應精心研讀，以增進其對於我國固有文化之了解，改善其日常生活之行為，並期在其未來之教學生活中能影響其所教之學生。
- 二、茲規定該院自本學期起即行實施，並限文到一週內依據下列要點，訂定實施辦法呈部。
 - (一) 各系學生，均須研讀《四書》，並《論》、《孟》、《學》、《庸》次序，分年讀畢。
 - (二) 以《四書》作為國文精讀教材，並在國文教學鐘點（或其他適當時間）內實施教學，不得額外增加學生課業負擔。
 - (三) 由臺灣省教育廳分發該院學生《四書集註》每人一冊。
 - (四) 應注意學習成績之考查。⁴⁷

雖然將「四書」列為師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的作法，在民國四十五年公佈的「修訂師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中並未顯現出來，⁴⁸不過在五十四年公佈的「修訂師範大學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表」中，就已列入其中，但未見具體學分規定。⁴⁹而在六十一年公佈的〈大學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中，則被放在「師範學院各學系加修科目」中，亦未見學分規定。⁵⁰這種作法一直延續到一九九〇年代，適用於師範體系的大專院校，⁵¹成為戰後

⁴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著：《大學科目表彙編》（臺北：正中書局，1961年），頁172。

⁴⁸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七年）》，頁2-3。

⁴⁹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頁3。案：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由教育部召開的師範大學各學院課程修訂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師範大學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其中規定：「四書」二至四學分，理學院各學系修一年；教育學院，教育學系及社會教育學系修兩年，其他各學系修一年；文學院國文學系修三年，其他學系修兩年。每一學年二學分，每學分每週二小時。惟會後理學院認為通過之科目表，仍有意見，乃於十二月廿八日召開理學院課程修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商結論：國文一科必需包括「四書」在內，且呈部長核定，「四書」一科應遵照教育部於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臺（43）普字第一二〇〇六號令，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以《四書》作為國文精讀教材，並在國文教學鐘點（或其他適當時間）內實施教學，不得額外增加學生課業負擔之規定辦理。以上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五十四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65年），頁261-262。看來，「四書」成為獨立的一門共同必修科目，或者依附於國文課程中實施，在師範院校內部，也存在著在兩種力量拉扯。

⁵⁰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必修科目表（民國六十一年）》，頁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頁16。

⁵¹ 參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總頁碼534；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

臺灣師範教育的一大特色。⁵²直到民國八十六年，教育部配合大法官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作出的釋字第 380 號解釋，從而對〈大學法施行細則〉進行修正，於該年十月十五日發布教育部（86）臺參字第 86119402 號令，賦予大學課程自主性，從此共同必修科走入歷史，改由各校自主。⁵³臺灣師範大學當於八十六學年即已停止將「四書」列入全校共同必修課程，⁵⁴但彰化師範大學至遲至千禧年，「四書」仍歸在全校必修的通識核心課程中，該校八十九學年的《課程手冊》還規定「四書」（一）、「四書」（二）皆各一學分二學期，開在大二上及大二下。然而在九十學年的《課程手冊》中就已非全校必修的課程了。⁵⁵

（三）復興中華文化旗幟下的經學課程

總體而言，遷臺後的高校經學課程，雖經歷年的課程修訂，在一般高校中文系和師範院校國文系方面仍主要以「專書選讀」的方式來實施，在整體方向上看似與大陸時期沒有太大的改變。但其實隨著戰後冷戰格局的形成，在反共抗俄的國策下，國民政府文教政策的走向日益回歸傳統，積極提倡中華固有文化，「尊經」、「重儒」、「崇孔」的氣氛愈發明

局，1985-1987 年），總頁碼 604；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總頁碼 1082、1103、1105、1106。案：《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所述民國八十二年以前之師範大學課程結構，「四書」隸屬於各學系必修科目的教育專業課程，乃必修而不計學分，每週上課二小時。而在師範學院則屬於「大學共同必修科目」及部分「師範學院各學系必修科目」中的語文學科，亦為零學分。參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頁 1082、1103。

⁵² 誠如邱燮友教授所說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創校以來，大一共同必修課程，除『國文』、『國音及語音運用』外，還有『四書』一門課程，數十年來，師範大學均重視師範生的養成教育，特別重視語文能力的培養和品德的陶冶，因而『四書』課程的開設，成為師範大學學生師資養成的一大特色。」見邱燮友：〈序〉，收入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四書教學研討會編：《儒學與人生——四書解讀及教學設計》（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 3 版），頁 3。

⁵³ 參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第 7 篇，頁 32。教育部部史網站，網址：http://history.moe.gov.tw/important_list.asp（最後瀏覽日期：2021.06.05）。

⁵⁴ 長期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的賴貴三教授，為回應筆者的詢問，從而檢索他的上課紀錄，發現八十五學年還有上過數學系的「四書」課，但八十六學年後就未再上過外系的「四書」，因此推測該校應該是在八十五學年結束（86 年 7 月）之後，終止將「四書」列為全校共同必修科目。案：該校於民國八十五學年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自訂共同必修科目之規畫案，並於八十六學年度起（即八十六年八月之後）適用於入學新生，其中已不見「四書」課的踪影，時間上與賴教授的上課紀錄正相吻合。參陳秀鳳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281-286。

⁵⁵ 此課程資料為黃忠慎教授提供，謹申謝忱於此。案：黃教授在九十二年為其《四書引論》撰寫〈序言〉時曾如此說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對於《四書》非常重視，用強迫性的方式來讓大家對於此一儒家學派的『基本功』能有基本的認識。例如，以往高中有門名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重點科目，內容就是《四書》的選讀，而以《論語》與《孟子》為主，聯考必考。師範院校更將《四書》訂為共同必修科目，我所服務的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前幾年絕大多數的同仁必須在外系學生面前講授四書學。」見黃忠慎：〈序言〉，《四書引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年），頁 1。

顯。例如，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教育部下達了一份題為「關於復興中華文化，改進大學課程」的公文，要求：

國文學系應講授五經、國文研究所應點讀十三經、四史。其他系科應講授有關中國典籍，所有各校其他課程，並應全盤檢討改進。⁵⁶

又如，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卅日，教育部發文給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和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希望受文單位參酌辦理：

我國祭孔古樂，夙有成章，為我中華文化精華之一。茲值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聲中，應予加強教育訓練，藉免失傳，而圖宏揚，建議該校院音樂科系加強祭孔古樂之教育訓練等由。⁵⁷

教育部對高校下達的這些指令，顯然都是貫徹當時正如火如荼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精神。關於此運動的緣起，據《中華百科全書》所述：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一百一十歲誕辰，先總統蔣公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會堂落成紀念文，其中言曰：「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當時參加此紀念會之全體人士，遂聯合簽名籲請政府明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同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於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恭請先總統蔣公為會長，督導推行中華文化復興工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即由此開始。⁵⁸

⁵⁶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臺（55）中字第二二八五九號令公佈，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部分，頁7。

⁵⁷ 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卅日臺（57）高字第九一五二號令公佈，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部分，頁2。

⁵⁸ 參中華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百科全書》第2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辭條，頁96。本辭條由陳立夫撰寫。

由此可知，透過官方主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持續推動，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尊經、重儒與崇孔的成份，乃得到高度的強化。⁵⁹

不過，早在民國五十四年的課程修訂中，就已藉由「《論語》《孟子》應必修」的規定，而突出了其時崇奉儒學的文化和教育走向。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之前的民國四十九年，即已成立了黨國色彩濃厚的孔孟學會。⁶⁰蔣中正（1887-1975）總統於民國五十年四月十日，在孔孟學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的致詞中就明確地將孔孟思想與三民主義做了緊密的結合，其謂：

中國文化傳統思想，就是孔孟之道，他是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的，他不僅要求好學求知，而且力行求仁。孔孟哲學，亦就是三民主義的本源，乃是知行合一，心物並重，以至於天人一體的哲學思想。故國文對於《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與《中庸》的三達德，尤其對於「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的哲理，推崇備至。其對於《禮運》〈大同篇〉，特別重視與提倡，亦就是直認孔子對於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的學理，建立了一個人生哲學完整的思想體系，只要我們能夠實踐力行，就能建立我們獨立平等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新國家，我們民族亦就可以恢復其固有地位，而不致為人所歧視了。

孔孟之道，既然攸關國家民族的生存與地位，所以他對孔孟學會提出如下要求：

孔孟學會最大的任務，乃在宏揚孔孟之道，使全國國民對三民主義的思想根源，都有其普遍而真切的認識，使其更易實踐力行，而發生事半功倍的效用。⁶¹

遷臺後的中華民國政府，面對艱困險惡的國際局勢和中共侵臺的強大壓力，因此在思想和文化領域上，一方面需要藉由構成傳統儒學核心的孔孟學說來與國民黨政府立國基礎

⁵⁹ 關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相關研究，可以參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林果顯：《文化、政治與時代——國家文化總會四十年》（臺北：國家文化總會，2008年）。

⁶⁰ 黃俊傑在〈戰後臺灣文化中儒學的保守思想傾向〉一文中，曾對孔孟學會的機關刊物《孔孟月刊》表現出的保守觀點，加以批判，認為其受到政治威權的干預與指導。他將其視做「官方意識的儒學」，並援引金耀基的說法，暗指其為「國家儒學」（state Confucianism）。參見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265。

⁶¹ 二段引文俱見蔣中正：〈對孔孟學會第一次大會致詞〉，收入蔣總統集編纂委員會編：《蔣總統集》第2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4年4版），頁2047。

的三民主義進行聯結，另一方面則透過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來與當時毀棄中國固有文化的中共政權抗衡，以強化統治的基礎和正當性，陳逢源教授對這個問題有精闢的分析：

臺灣近五十年來的蓬勃發展，儒家思想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四書》是傳布孔、孟思想的主要憑藉，也是攸關文化存亡繼絕的重要指標。

又云：

……海峽兩岸分治，在不同意識形態下，為對應馬列思想，反制文革反傳統的訴求，臺灣當局以加強倫理道德教育，落實文化薪傳為主軸，表彰《四書》自然也就成為臺灣學術教育上強調的重點。⁶²

在這樣的形勢下，儒家經典，尤其是《四書》，在高校教育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甚至將其列為中小學師資培育主要管道的師範院校之共同必修科目中，以期師範生將來「能影響其所教之學生」。由此可見，經學及儒學得以在戰後臺灣高校（甚至及於中等教育）傳揚不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確實是執政當局透過體制的設計所引導的結果。在後科舉時代，重新將儒家經典與教育緊密的結合（尤其體現在師範院校），這樣的成就是極引人注目的。⁶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大學雖從傅斯年（1896-1950）校長時期將《史記》與《孟子》定為全校大一國文的共同教材，後因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講授《論語》、《孟

⁶² 以上分別見陳逢源：〈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四書學之研究〉，《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頁498、414。此文最先收錄於林慶彰主編之《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1950-200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題名〈四書研究〉。惟收錄《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者，文字頗有改易。

⁶³ 《四書》對臺灣中等教育的影響或許更超過高等教育，透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後改稱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中等學校的教授，傳統儒家思想得以灌輸給接受國民義務教育的廣大人民。但其引起的爭議，至今不絕。相關討論可參看陳怡如：《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沿革及其爭論之考察——以民國51（1962）年至民國88（1999）年為考察範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頁1-161。有趣的是，早在國民政府治理大陸時期，曾任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汪辟疆（1887-1966）即曾為文對中文系必修科目表中的「專書選讀」表示異議，其中有謂：「《論語》、《孟子》、《戰國策》，此三書宜在高中授讀。」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779。汪氏當著眼於古籍內容深淺的角度而發此議論，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在戰後臺灣的教育環境中，《論》《孟》的重要性卻與日俱增，一體被納入普通中學和大專院校的課程中，持續地教授下去。

子》，遂將大一國文的《孟子》改換為《左傳》。⁶⁴這個做法從三十八學年度起，一直實施到六十一學年度止。⁶⁵不過傅斯年及臺大校方當非基於尊經的角度或經學本位的立場而做此安排，據長期任教臺大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1914-2008）回憶：

傅先生所以規定教《孟子》和《史記》，我想，傅先生高昂磅礴的氣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很相近；傅先生才情的卓越，學識的淵博，見解的特出，文筆的雄奇，跟司馬遷很接近。因此，不期其然而然的，便決定用《孟子》和《史記》這兩部書作大一國文教材。⁶⁶

不同於王叔岷過於強調傅斯年才情與孟、遷的相似，也有人指出傅斯年「以《孟子》與《史記》作為大學國文的主要內容，其目的不在語文訓練而在於增進知識分子的立身氣節與觀照時間發展的史識。」⁶⁷而從實際負責施教的臺大中文系的立場來說，所著重的則是在「文化、思想教育和語文訓練」等面向。⁶⁸由此皆可看出，早年臺大將《孟子》當作大一國文的教材來教授，應與師範院校體系從尊經崇孔的立場來推動「四書」課程，其心態和目的確實是極大不同的。即使之後將《孟子》改換為《左傳》，其基調應仍是大致不變的。

（四）「專書選讀」外的經學課程

當時高校中的課程開設也大致落實了教育部頒定的科目表的規定，但各校的實際開課情形，如某科目的開設與否、必選修和學分數，常常還是得因應各校的現實狀況。以政大中文系為例，「專書選讀」中的七部經書在民國四十至六十年代間的整體課程結構中的重要性並不相同，「論語」、「孟子」、「毛詩」和「禮記」一直都被列為必修課，「周易」和「尚書」則為選修，「左傳」則始為必修後又改為選修，並不固定。且這些課的學分數亦在上下學期 2 學分和上下學期 3 學分間浮動。⁶⁹

⁶⁴ 何寄澎：〈當前大學國文教學改進之觀察與省思——以清華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大學為例〉，《教育資料輯刊》第 15 輯（1990 年 6 月），總頁 192。

⁶⁵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 年），頁 336。

⁶⁶ 王叔岷：《慕廬憶往》（臺北：華正書局，1993 年），頁 76。

⁶⁷ 編輯室：〈大學國文教育的省思〉，《通識在線》第 75 期（2018 年 3 月），頁 18。

⁶⁸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頁 336。

⁶⁹ 車行健：〈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經學教育〉，《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7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51-53。

再就歷年課程資料保存最為完整的臺大中文系來看，在 41-5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修課程中，除「易經」外的六部經書皆有開設，且皆為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不過除「詩經」、「尚書」、「禮記」、「論語」開設較頻繁外，「孟子」只有在 49 學年開過一次。而在 51-6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修課程中，共開有「詩經」、「尚書」、「左傳」、「國語」、「論語」和「孟子」等專書選讀的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但特別的是，則是加開有「論語導讀」、「論孟導讀」和「孟子導讀」的課，這三門課的開設情況與既有的「論語」、「孟子」關係為何，並不十分清楚。此外，在選修課程中，又開有「尚書研究」、「三禮專題研究」、「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孟子的生平和思想」的課，當是和研究所課程合開者，皆亦見於研究所的課程。不過令人不解的是，研究所中課程又載有「周易研究」和「禮記」兩門課，皆標為「專書選讀」，當是與大學部合開者。在 61-7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選修與必修課程中，則開有「詩經」、「尚書」、「禮記」、「左傳」、「論孟選讀」和「大學研究」的「專書選讀」課，前四者都是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論孟選讀」為上下學期 2 學分，「大學研究」則為單學期 3 學分。在選修課程中，又開有「儀禮研究」、「三禮研究」。在 71-8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修課程中，開有「周易」、「尚書」、「詩經」、「左傳」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以及「論孟導讀」上下學期 2 學分的課。「禮記」則被列進選修課程中，亦是上下學期 3 學分。⁷⁰

時至今日，即使專書選讀的統一課程規範已不復存在，這幾種基本的儒家經典仍持續在各高校中文系的課堂中，被視為重要的科目而被教授著。雖然各校的情況不同，有的學校開得多而全，有的學校只能開設其中一兩種。但可以說，戰後臺灣高校的經學教育主要就是以儒家經典教育為主的方式來推動，儒家經典的教授構成了戰後臺灣經學教育的基礎，

至於以經學為整體對象教授的課程，如經學概論及經學史，甚至專題性的課程，則主要見於中文系大學部的選修課程和研究所課程。且相較於儒家經典課程來說，在各校統一遵行教育部頒行的科目表來施教的年代，大學部選修科目的數量和變化較少，且研究所的設立亦不普遍，所以總體來說，這類以經學整體為教授對象的課程，是不如儒家經典課程來得普遍廣泛。但這類的課程，其內容往往涉及經學的整體和專精的知識，透過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和研究所專題式的研習，較可以起到凝聚學習者的經學學科意識，以及促進對其深入鑽研的正面作用，相信這也是造就戰後臺灣經學蓬勃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⁷⁰ 以上俱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附錄，頁 995、1000、1003、1007-1008、1010、1014、1017、1037。案：61-70 學年間的「大學研究」被同時列入大學部「必選修與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中，因「必選修與必修課程」中註明為專書選讀，故本文將其歸入「必選修與必修課程」中。

以大學部課程來說，政大中文系遲至民國六十年代才開始開設「經學概論」，⁷¹但此並非各大學的常態，檢視成功大學中文系民國七十二、七十五和八十二年日夜間部的課表，皆未見此課。⁷²而臺灣大學中文系的歷年課表中，亦從未出現此科目。反之，一般中文系較不常會有的「經學史」則早在民國四十八年就已由戴君仁（1901-1978）開設，直至程元敏於民國七十年接手時，改稱「中國經學史」。由於臺大中文系常有中文系、所共開同課程的作法，因而這也只能視做比較特殊的狀況。⁷³事實上，研究所專精且集中深入的教學取向，相較大學部而言，確是較適合開設此類課程。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於民國六十七年編印的《大學暨獨立學院各研究所博碩士班現行科目表》中所列各校課程，來做例舉式的觀察，可以看到，在當時設有中文研究所的八所公私立院校中，除東吳大學中研所博碩士班外，其餘的七所皆開有經學相關的課程，如臺大博士班有「論孟導讀」、「左傳」、「詩經」、「尚書」等，碩士班亦有「詩經研究」。政大碩士班有「經學史」、「孔孟學說」、「周易研究」、「尚書研究」、「詩經研究」、「春秋研究」、「三禮研究」、「爾雅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博士班合開有「群經大義」、「三禮研究」、「春秋研究」，博士班另開有「尚書研究」、「爾雅研究」。碩士班亦另開有「詩經研究」和「詩經研究方法論」。私立輔仁大學碩士班則開有「經學專題研究」和「禮學研究」。省立高雄師範學院、私立東海大學和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的碩士班皆開有「群經大義」。⁷⁴當然該年的《科目表》遠不足以反映實際的情況，且有些學校只是概略性的提供有關科目（如臺大），但大體仍可以約略呈顯經學課程在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班實施的概況。從中可以看到，即使研究所的環境遠較大學部適合開展經學整體且專精的課程，然而除了「經學史」、「群經大義」和「經學專題研究」外，大多仍是對經書深入研究的課程，再一次印證了經學教育的主體仍是在經書的研習教授的事實。

⁷¹ 由於資料不全，今日所能掌握當年開課的資訊，最早只能追溯至民國六十六年。然又於民國六十九學年將此課名改為「經學通論」，延用至今。參車行健：〈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經學教育〉，頁54。

⁷²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國立成功大學概況（七十二學年度）》（臺南：國立成功大學編印，1983年），頁50-63；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國立成功大學概況（七十五學年度）》（臺南：國立成功大學編印，1986年），頁51-70；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國立成功大學概況（八十二學年度）》（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印，1993年），頁50-52。

⁷³ 以上俱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附錄，頁996、1000、1010、1017、1021、1036、1038、1046、1049。

⁷⁴ 以上俱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暨獨立學院各研究所博碩士班現行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8年），頁1、37、127-128、159-162、301-302、311-313、480-481、482-484、504-505、525-527、595-596、602-603。

（五）大學課程自主化後的經學課程

隨著教育部對統一課程規範的做法逐漸弱化，高校系所對課程的自主性日愈強化，課程的多樣性也變得更加明顯，和以往經書課程僅限於「五經」與「四書」，以及經學整體課程只開有「（中國）經學史」、「經學通（概）論」、「群經大義」的情況相比，近年來各校中（國）文系所開設的經學課程顯得活潑變化多了，以 103-107 學年為例，出現了諸如「清代十三經新疏專題討論」、「經學文獻學研究」、「古禮書與古禮儀節研究專題」（臺大中文系研究所 103-106 學年課程）、「《孝經》與儒家倫理」（中央大學中文系大學部 103、106 學年課程）、「科舉與經學專題研究」（成功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5、107 學年課程）、「春秋今文學」（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3、105、107 學年課程）、「宋明經學專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4 學年課程）、「臺灣經學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7 學年課程）、「左傳學與現代生活」、「論孟思想與現代生活」（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大學部 107 學年課程）。⁷⁵從早期的制式規範到後來的多元豐富，從中亦見證了戰後臺灣經學教育與時俱進的發展。

四、結論

經過以上的探討，可約略總結以下幾項重點，做為本文的結論：

第一，中華民國大學院校的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必修課程又有「全校共同必修科目」（於民國八十六年廢止）和「各學系必修科目」，二者必須依照教育部公布的「大學必修科目表」（含「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各學系必修科目表」來施行；選修科目則由各校自訂。⁷⁶雖然經學課程（包含經書及經學整體）主要由中文系和師範院校的國文系（包含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及在職專班）來施教，中（國）文系的「專書選讀」規定的《五經》與《論》《孟》（後擴大為《四書》），大多被列為必修科目，而得以較普遍地為中文系的學生所習得。其他少數被列為選修的經學專書和較晚才有的「經學通（概）論」（臺大的「（中國）經學史」是特例），和研究所碩博士班的整體及專經的課程，則提供了更全面及更深入的經學課程。而在師範院校則將「四書」列入全校共同必修科目，冀望師範生能影響學生，使得《四書》的研習不是只局限在中文系與國文系內部，而擴及了全體師範院校的學

⁷⁵ 以上資訊俱見於各校課程網站，係由政治大學中研所林軒名同學代為搜尋所得，謹致謝忱於此。

⁷⁶ 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總頁 1081。

生。雖然其利弊得失有仁智之見，師範院校的《四書》強制教學，仍可說是戰後臺灣經學教育最有實效的成就。

第二，在大陸時期的課程制定理念下，將經書納入「專書選讀」中，雖然使得《五經》和《論》《孟》這七部經書獲得課程的保障，但這種設計並沒有太多「尊經」、「崇孔」的味道，更與當時舊派人士推動的讀經運動無關，純粹只是從經典的角度出發，挑選出包括經史子集的二十餘部重要經典，做為「專書選讀」課程的開課範圍，以此來規範就讀中（國）文系的學生研習其中的某些經典。國民政府來臺後，有意地從教育體制方面來貫徹當時的文化政策，因而對傳統的孔孟儒學及儒家經書大力地強調。不但突出了《十三經》的重要，而且更強化了《四書》的課程，在師範院校更擴大成為全校共同必修的科目。如果將中等學校所施教的以《四書》為主體編纂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後改稱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也算上去的話，則幾可說《四書》是戰後臺灣經學教育的最主要內容。透過學校課程體制的強制性教育，達到了民國初年以來推動讀經運動的衛道人士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所無法企及的成就。

第三，經學課程包含經書和經學整體這兩類的課程，前者在「專書選讀」的規範下，限制為《五經》系統的《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附《國語》），和《四書》系統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但在超脫「專書選讀」的窠臼成規後，以及印證研究所開設既有課程的基礎上，則又可擴及到諸如《爾雅》、《孝經》、《三禮》和《春秋三傳》等非《五經》、《四書》範圍內的其他經書。將大陸時期和戰後臺灣的高校經學課程的發展來做一整體的回顧與評估，可以看到經書課程的施教成果顯然較為完整豐富，而這也為經書的研究奠下厚實的基礎。反觀，經學整體的課程，如「經學通（概）論」或「群經大義」，或者受限於講授者的學養，難以兼通群經，在自己專精的領域之外，不容易擁有太多獨到的見解；又或者囿於概論的性質，講授者著重於基本概念與學理的介紹，無法講得太深入，且多是一經一經的介紹，不易形成整體性、系統性的知識體系，因而難以從「概論」跨越到「通論」，實際表現出來的大都是「群經概論」。又如「中國經學史」的課程，無論是通史或斷代史，涉及的經學家、經學典籍、經學議題，相關聯的歷史背景知識和文獻史料，以及採取的史觀和運用的方法等……，均甚為繁複龐雜，講授者要對之擁有通盤的掌握和專門的見解，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而相較於有固定範圍的經書而言，無邊無際的經學整體的課程確實是較吃力不討好的。這直接反映在教科書或專書的編纂成果上。「經學通（概）論」、「群經大義」和「（中國）經學史」之類的著作，無論在出版的數量上或內容的創新上，相較於個別經書的注譯及教學和研究的專著之寫作與出版，似均

遜色不少。⁷⁷因此，若從教學與研究一體的角度來反思這個問題，當務之急或許應如何在既有經書教學與研究的良好基礎上，持續加強經學整體的教學與研究的質量，此實攸關經學這門學問領域能否持續進步與發展的重要關鍵。

⁷⁷ 曹錦年曾蒐集近代經學概論（含經學史）類著作，從 1907 年到 2016 年的一百一十年間，涵括中國大陸、臺灣及日本等地所產出者，共得書六十有奇。曹景年輯：〈近代以來經學概論類著作彙總〉，2019 年 6 月 27 日發佈於「求是齋語」微信公眾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ikyMY4PC71jHuTiMqsx4bg>（最後瀏覽日期：2021.06.05）雖仍有遺漏，但整體來講，數目確實不多，且 1949 年前的著作遠超過 1949 年後者。這個現狀固然反映了近代以來經學研究的沒落，同時也說明了以經學為整體關涉對象的著作難為之窘境。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 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 Zhong Hua Min Guo Shi Jiao Yu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Zhong Hua Min Guo Shi Jiao Yu Zhi (Chu Gao)*（臺北 Taipei：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1990 年）。
- 中華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 Zhong Hua Bai Ke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中華百科全書》*Chinese Encyclopedia* 第 2 冊（臺北 Taipei：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Hwa Kang Publishing Center，1981 年）。
- 王叔岷 Wang, Shu-Min：《慕廬憶往》*Mu Lu Yi Wang*（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Book Company，1993 年）。
- 王應憲 Wang, Ying-Xian：〈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Min Guo Shi Qi Da Xue Jing Xue Jiao Yu Jian Shi”，《中國學術年刊》*Studies in Sinology* 第 35 期（2013 年 9 月），頁 109-129。DOI：10.6238/SIS.201309.05。
- 王應憲 Wang, Ying-Xian：〈舊學新制：京師大學堂經科大學史事考〉“Jiu Xue Xin Zhi: Jing Shi Da Xue Tang Jing Ke Da Xue Shi Shi Kao”，《史林》*Historical Review* 2018 年第 1 期（2018 年 2 月），頁 96-107。
- 王應憲 Wang, Ying-Xian 編：《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Xian Dai Da Xue Shi Xue Xi Gai Lan (1912-1949)*（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8 年）。
- 左玉河 Zuo, Yu-He：《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Cong Si Bu Zhi Xue Dao Qi Ke Zhi Xue —— Xue Shu Fen Ke Yu Jin Dai Zhong Guo Zhi Shi Xi Tong Zhi Chuang Jian*（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 Company Press，2004 年）。
- 朱自清 Zhu, Zi-Qing：〈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Bu Ban Da Xue Zhong Guo Wen Xue Xi Ke Mu Biao Shang Que”，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Zhu Zi Qing Xian Sheng Quan Ji*（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ress，1993 年），卷 2。
- 朱自清 Zhu, Zi-Qing：《經典常談》*Jing Dian Chang Tan*，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Zhu Zi Qing Xian Sheng Quan Ji*（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ress，1993 年），卷 6。
- 李孝定 Li, Xiao-Ding：《逝者如斯》*Shi Zhe Ru Si*（臺北 Taipei：東大圖書公司 The Grand East Book co., Ltd.，1996 年）。

- 汪辟疆 Wang, Bi-Jiang：《汪辟疆文集》*Wang Bi Jiang We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
- 車行健 Che, Xing-Jian：《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Xian Dai Xue Shu Shi Yu Zhong De Min Guo Jing Xue —— Yi Ke Cheng, Xue Feng Yu Ji Zhi Wei Zhu Yao Guan Zhao Dian*（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公司 Wan Juan Lou Books Company，2011 年）。
- 車行健 Che, Xing-Jian：〈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經學教育〉“Zhi Nan Shan Xia Jing Shi Ye, Du Chuan Tou Bian Bai Nian Gong ——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Zai Tai Fu Xiao Chu Shi Jie Duan (1954-1982) De Jing Xue Jiao Yu”，《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27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45-82。DOI：10.30103/NICLP。
- 何寄澎 He, Ji-Peng：〈當前大學國文教學改進之觀察與省思——以清華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大學為例〉“Dang Qian Da Xue Guo Wen Jiao Xue Gai Jin Zhi Guan Cha Yu Xing Si —— Yi Qinghua Daxue, Zhengzhi Daxue, Taiwan Daxue Wei Li”，《教育資料集刊》*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第 15 輯（1990 年 6 月），頁 192。
- 何炳棣 He, Bing-Di：《讀史閱世六十年》*Du Shi Yue Shi Liu Shi Nian*（臺北 Taipei：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2004 年）。
- 汪伯軒 Wang, Bo-Xuan：《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Chen Li Fu Yu Zhan Shi Zhong Guo Gao Deng Jiao Y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MS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2012 年）。
- 林桶法 Lin, Tong-Fa：《1949 大撤退》*1949 Da Che Tu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2009 年）。
- 林果顯 Lin, Guo-Xian：《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Zhong Hua Wen Hua Fu Xing Yun Dong Tui Xing Wei Yuan Hui Zhi Yan Jiu (1966-1975) —— Tong Zhi Zheng Dang Xing De Jian Li Yu Zhuan Bian*（臺北 Taipei：稻鄉出版社 Daoxiang Press，2005 年）。
- 林果顯 Lin, Guo-Xian：《文化、政治與時代——國家文化總會四十年》*Wen Hua, Zheng Zhi Yu Shi Dai——Guo Jia Wen Hua Zong Hui Si Shi Nian*（臺北 Taipei：國家文化總會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ACC，2008 年）。
- 周予同 Zhou, Yu-Tong：《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Zhou Yu Tong Jing Xue Shi Lun Zhu Xu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6 年）。
- 胡山源 Hu, Shan-Yuan：〈論大學國文系及其科目〉“Lun Da Xue Guo Wen Xi Ji Qi Ke Mu”，《國文月刊》*Guo Wen Yue Kan* 第 49 期（1946 年 11 月），頁 20。

- 桑兵 Sang, Bing :《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Wan Qing Min Guo De Guo Xue Yan Jiu*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2001 年)。
- 陳立夫 Chen, Li-Fu :《從根救起》*Cong Gen Jiu Qi* (臺北 Taipei : 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Ltd. , 1970 年)。
- 陳立夫 Chen, Li-Fu :《戰時教育行政回憶》*Zhan Shi Jiao Yu Xing Zheng Hui Yi*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73 年)。
- 陳立夫 Chen, Li-Fu :《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Wo De Chuang Zao, Chang Jian Yu Fu Wu* (臺北 Taipei : 東大圖書公司 The Grand East Book co., Ltd. , 1989 年)。
- 陳立夫 Chen, Li-Fu :《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Cheng Bai Zhi Jian: Chen Li Fu Hui Yi Lu* (臺北 Taipei : 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 1994 年)。
- 陳秀鳳 Chen, Xiu-Feng 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Guo Li Taiwan Shi Fan Da Xue Xiao Shi*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2016 年)。
- 陳怡如 Chen, Yi-Ru :《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沿革及其爭論之考察——以民國 51 (1962) 年至民國 88 (1999) 年為考察範疇》*Taiwan Zhong Guo Wen Hua Ji Ben Jiao Cai Ke Cheng Yan Ge Ji Qi Zheng Lun Zhi Kao Cha —— Yi Min Guo 51 Nian (1962) Zhi Min Guo 88 Nian (1999) Wei Kao Cha Fan Wei* (臺北 Taipei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MS thesis, Master of Arts in Chinese Teach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2014 年)。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 :《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Zhu Xi Yu Si Shu Zhang Ju Ji Zhu* (臺北 Taipei : 里仁書局 Lejnbook , 2006 年)。
- 黃俊傑 Huang, Jun-Jie :《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Taiwan Yi Shi Yu Taiwan Wen Hua* (臺北 Taipei :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2011 年)。
- 黃忠慎 Huang, Zhong-Shen :《四書引論》*Si Shu Yin Lun* (臺北 Taipei : 文津出版社 Wenchin Publishing House , 2003 年)。
-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編 :《大學科目表》*Da Xue Ke Mu Biao* (重慶 Chongqing : 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 1940 年)。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 :《修訂大學科目表 (民國四十四年)》*Xiu Ding Da Xue Ke Mu Biao (The 44th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臺北 Taipei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 1955 年)。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 :《修訂大學科目表 (民國四十七年)》*Xiu Ding Da Xue Ke Mu Biao (The 47th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臺北 Taipei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 1958 年)。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著 :《大學科目表彙編》*Da Xue Ke Mu*

Biao Hui Bian (臺北 Taipei: 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1961 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

Xiu Ding Da Xue Ke Mu Biao (The 54th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臺北 Taipei: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1965 年初版、1970 年再版)。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五十四年)》

Xiu Ding Da Xue Ke Cheng Bao Gao Shu (The 54th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臺北 Taipei: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1965 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大學必修科目表(民國六十一年)》

Da Xue Bi Xiu Ke Mu Biao (The 61th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臺北 Taipei: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1972 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

Xiu Ding Da Xue Ke Cheng Bao Gao Shu (The 62th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臺北 Taipei: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1973 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修訂大學必修科目表報告書(民國六十六年)》

Xiu Ding Da Xue Bi Xiu Ke Mu Biao Bao Gao Shu (The 6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臺北 Taipei: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1977 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編:《大學暨獨立學院各研究所博碩士班現

行科目表》*Da Xue Ji Du Li Xue Yuan Ge Yan Jiu Suo Bo Shuo Shi Ban Xian Xing Ke Mu Biao* (臺北 Taipei: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OE, 1978 年)。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編:《國立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Guo Li Tai Wan Da Xue Zhong Guo Wen Xue Xi Xi Shi Gao (1929-2014)*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4 年)。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 Guo Li Cheng Gong Da Xue Jiao Wu Chu Chu Ban Zu 編:《國立成功大學

概況(七十二學年度)》*Guo Li Cheng Gong Da Xue Gai Kuang (The 72th academic year)* (臺南 Tainan: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983 年)。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 Guo Li Cheng Gong Da Xue Jiao Wu Chu Chu Ban Zu 編:《國立成功大學

概況(七十五學年度)》*Guo Li Cheng Gong Da Xue Gai Kuang (The 75th academic year)* (臺南 Tainan: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986 年)。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 Guo Li Cheng Gong Da Xue Jiao Wu Chu Chu Ban Zu 編:《國立成功大學

概況(八十二學年度)》*Guo Li Cheng Gong Da Xue Gai Kuang (The 82th academic year)* (臺南 Tainan: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993 年)。

-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四書教學研討會 Guo Li Shi Fan Da Xue Guo Wen Xi Si Shu Jiao Xue Yan Tao Hui 編：《儒學與人生——四書解讀及教學設計》*Ru Xue Yu Ren Sheng —— Si Shu Jie Du Ji Jiao Xue She Ji*（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Ltd.，2006 年 3 版）。
-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 Qing Hua Da Xue Xiao Shi Yan Jiu Shi 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Qing Hua Da Xue Shi Liao Xuan Bian*（北京 Beijing：清華大學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1991 年）。
-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 The 4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MOE 編：《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The 4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1974 年）。
- 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 The 5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MOE 編：《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The 5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1985-1987 年）。
- 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 The 6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MOE 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The 6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1996 年）。
- 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 The 7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MOE 編：《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The 7th Zhong Hua Min Guo Jiao Yu Nian Jian*，教育部部史網站，網址：http://history.moe.gov.tw/important_list.asp（最後瀏覽日期：2021.06.05）。
- 張緒心 Zhang, Xu-Xin、馬若孟 Ma, Ruo-Meng 編述，卜大中 Bu, Da-Zhong 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Bo Yun Er Jian Qing Tian: Chen Li Fu Ying Wen Hui Yi Lu*（臺北 Taipei：近代中國出版社 Modern China，2005 年）。
- 葉文心 Ye, Wen-Xin 撰，馮夏根 Feng, Xia-Gen 等譯：《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Min Guo Shi Qi Da Xue Xiao Yuan Wen Hua (1919-1937)*（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2 年）。
-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委會編輯小組 Tai Wan Jiao Yu Fa Zhan Shi Liao Hui Bian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Ji Xiao Zu, Tai Wan Sheng Zheng Fu Jiao Yu Ting 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大專教育篇》*Tai Wan Jiao Yu Fa Zhan Shi Liao Hui Bian: Da Zhuan Jiao Yu Pian*（臺中 Taizhong：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Tai Wan Sheng Li Tai Zhong Tu Shu Guan，1987 年）。
- 蔣中正 Jiang, Zhong-Zheng：〈對孔孟學會第一次大會致詞〉“Dui Kong Meng Xue Hui Di Yi Ci Da Hui Zhi Ci”收入蔣總統集編纂委員會 Jiang Zong Tong J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蔣總統集》*Jiang Zong Tong Ji* 第 2 冊（臺北 Taipei：中華大典編印會 Zhonghua Dadian Bian Yin Hui，1974 年 4 版），頁 2047。

- 楊晉龍 Yang, Jin-Long、蕭開元 Xiao, Kai-Yuan 整理：〈朱維錚教授談近代經學史研究相關問題〉“Zhu Wei Zheng Jiao Shou Tan Jin Dai Jing Xue Shi Yan Jiu Xiang Guan Wen Ti”，《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10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頁 137-145。DOI：10.30103/NICLP.200006.0005。
- 楊儒賓 Yang, Ru-Bin：《1949 禮讚》*1949 Li Za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2015 年）。
- 蔡元培 Cai, Yuan-Pei 等著：《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Wan Qing San Shi Wu Nian Lai Zhi Zhong Guo Jiao Yu: 1897-1931*（香港 Hong Kong：龍門書店 Longmen Book Store，1969 年）。
- 蔡元培 Cai, Yuan-Pei：《自寫年譜》*Zi Xie Nian Pu*，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 Zhong Guo Cai Yuan Pei Yan Jiu Hui 編：《蔡元培全集》*Cai Yuan Pei Quan Ji*（杭州 Hangzhou：浙江教育出版社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8 年），卷 17。
- 編輯室 Editing Room：〈大學國文教育的省思〉“Da Xue Guo Wen Jiao Yu De Xing Si”，《通識在線》*General Education Online* 第 75 期（2018 年 3 月），頁 18。
- 錢穆 Qian, Mu：《師友雜憶》*Shi You Za Yi*，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Qian Bin Si Xian Sheng Quan Ji* 第 51 冊（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1998 年）。
- 錢穆 Qian, Mu 口述、胡美琦 Hu, Mei-Qi、何澤恆 He, Ze-Heng、張蓓蓓 Zhang, Bei-Bei 整理：《經學大要》*Jing Xue Da Yao*，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Qian Bin Si Xian Sheng Quan Ji* 第 52 冊（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1998 年）。
- 蕭超然 Xiao, Chao-Ran 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Bei Jing Da Xue Xiao Shi (1898-1949)*（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年）。
- 龔鵬程 Gong, Peng-Cheng 主編：《讀經有什麼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Du Jing You Shen Me Yong —— Xian Dai Qi Shi Er Wei Ming Jia Lun Xue Sheng Du Jing Zhi Shi Yu Fei*（上海 Shanghai：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 年）。
- 曹景年 Cao, Jing-Nian 輯：〈近代以來經學概論類著作彙總〉“Jin Dai Yi Lai Jing Xue Gai Lun Lei Zhu Zuo Hui Zong”，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ikyMY4PC71jHuTiMqsx4bg>（最後瀏覽日期：2021.06.05）

附錄：推薦書目（參註 14）

王應憲編：《現代大學史學系課程概覽（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王壽南、張哲郎編：《中華民國大學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2 年。

李東華：〈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收入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年。

車行健編：《傳經授業——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教育》，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 年。

金培懿：〈港大『中國經學』課程之退場——一個東亞視域的考察〉，《人文中國學報》第 23 期，2016 年 12 月。

吳國武：〈早期北京大學與傳統經學的近代轉型：晚清民初經學探研錄之一〉，《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 10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姚丹：〈西南聯大中文系、外文系的課程設置與目標〉，收入程光燁主編：《都市文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陳平原：《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陳平原：〈「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收入陳平原：《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陳弱水：〈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1950-1970）〉，《臺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2010 年 6 月。

陳國球：〈文學作為知識的思考〉，《2012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演講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14 年。

陳國球：〈文學批評做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2012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演講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14 年。

陳國球：〈文學批評做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兼談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2013 年 12 月。

黃明喜：〈中國近代大學經學學科的建構及終結〉，《復旦教育論壇》，2015 年第 4 期。

張哲郎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3 年。

許振興：《經學、教育與香港大學——二十世紀的足跡》，香港：中華書局，2020 年。

鮑國華：〈小說進入大學課堂以前——對北京大學國文門研究所小說科的追懷與闡釋〉，《新文學史料》，2015 年第 4 期。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年。

The Classicism Courses unde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CHE ,HSING-CHIEN

(Received October 12, 2020 ; Accepted December 1, 2020)

Abstract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Classicism have experienced many challenges,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which is its connection with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Classicism was disbanded and merged into other new disciplin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lated courses of Classicism were cancelled in schools at all levels. However, before the 1930s, the Classicism still received a certain degree of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re was still room for survival in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determined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organize and standardize college courses from the system to the face. This approa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ism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is planned to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half is mainly in the mainland perio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ism toward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unde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second half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aiwan after 1945, hoping that through such explorations, we can have a clearer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state of Classicism in the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Keywords :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urriculum standardization, Classicism courses,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